

新加坡 华商先贤

孙中山得以在东南亚拓展其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一批华商支持者的帮助。在新加坡，这些支持者同时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华社领袖，并受英殖民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重视。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之际，华商在本地华社已享有近百年的领导地位。鉴于英殖民政府的重商政策，他们在开埠以来便处于社会顶层，并通过各种商业活动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他们在发迹后更出资建立华社三大支柱—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及华文报刊。

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标志华社进入突破帮群藩篱的新时代。嗣后，总商会在多个历史转折点扮演关键的领导角色，除了引导本地华社关注家乡情况，更在危机时刻动员他们群策群力渡过难关。

在新加坡于1950年代至1965年迈向自治和独立时期，商会领袖积极协助华人居民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融入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的国家。

19世纪的 华商经济

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后，莱佛士的重商政策吸引了各国贸易商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来自马六甲和中国的华商。华商在此时从事的行业是多元化的，主要有贸易、航运、烟酒包税、种植、采矿、房地产等。他们在新加坡这个繁忙的转口贸易中心扮演关键的中介商角色，促成中国产品和人力、欧洲工业制成品以及东南亚土产的交换和流通。

马六甲闽商

许多马六甲闽商于1824年至1827年间迁移新加坡，形成了一个财势雄厚的集团。他们的祖籍多为福建省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世代在马六甲定居和经商，后被莱佛士的重商政策吸引到新加坡，备受英国人欢迎和重视，迅速成为本地福建帮乃至整个华社的领袖。

华南商人

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移民包括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及福州人等。他们当中虽也有人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但整体而言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及马六甲漳泉商人。

甘蜜与胡椒种植

英国人于1819年来到新加坡时，岛上已有20处华人与马来人开垦的甘蜜园丘。由于提炼甘蜜后留下的甘蜜渣是胡椒藤的好肥料，也可用来保护胡椒藤的根，因此甘蜜园一般也兼种胡椒。甘蜜可用来鞣皮和染色，1830年代曾是新加坡出口到英国的重要经济作物，由柔佛和廖内出产并经由新加坡转运其他国家。19与20世纪之交，甘蜜、胡椒价格大跌，加上劳工短缺与甘蜜的种植严重破坏土地，使之难以为继。

锡矿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锡矿业是马来亚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马来亚的锡矿主要集中在马来半岛西岸的霹靂州和雪兰莪州，而锡矿业的发展不但为许多华商带来巨富，也促使大量华工流入马来亚。

20世纪的 华商经济

进入20世纪，马来亚半岛橡胶、锡与其他土产的产量和价格激增，促进了新加坡这个贸易商港的发展。中国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也推动大量的华人移民漂洋过海来新加坡谋生。此时，本地华商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变得更多元化。除了在传统的出入口与零售业继续保持优势，他们也积极投资橡胶和黄梨等新兴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而游资充裕者亦开始进军银行业。

橡胶与黄梨业

轮胎于19世纪发明，促使全球对橡胶的需求量激增。此时新加坡主要经济作物甘密和胡椒，亦被橡胶与黄梨（也称菠萝或凤梨）所取代。由于橡胶树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才会成熟并产生胶液，而黄梨只需种植一年多便可收割，因此园主在头几年会先从后者取得收入。除了种植橡胶和黄梨，不少华人园主更进军橡胶加工和产品制造业，同时也成为黄梨罐头业的巨擘。



用来制作胶片的压片机（年份不详）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藏

橡胶与黄梨大王

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陈嘉庚和李光前等实业家都曾经营橡胶和黄梨园丘。除了种植橡胶和黄梨，他们也开设工厂将它们加工售卖，当中更有人凭此建立巨大的商业王国，被冠以“橡胶大王”和“黄梨大王”的称号。

来自热带的独特风味

黄梨曾是新加坡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19世纪末至上世纪60年代，本地的义顺、三巴旺和裕廊等地区都曾有许多黄梨园。这些黄梨在收割后会被制作成黄梨罐头。到了1930年代，新加坡每年出口的黄梨罐头已达150万箱。这让马来亚成为仅次于夏威夷的黄梨罐头第二大生产地。

银行业

19世纪末，新加坡的银行和金融业主要由西方银行掌控。后来，一些华商因锡矿业和橡胶业前景一片大好而游资充足，决定开办银行。1903年，新加坡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开业，为华商提供贷款服务。之后，四海通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及华侨银行先后成立。19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后，华商银行、和丰银行以及华侨银行三家银行于1932年合并成“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也就是今日新加坡人所熟悉的“OCBC银行”。

华文教育

由于英殖民政府漠视本地华人教育，最初的华文学校需靠华社出钱出力创办。它们最初以各方言群成立之义学的形式出现，教学媒介语也以方言为主。这类学校财力薄弱，师资、设备和管理制度都有欠理想。

直到20世纪初，本地华文教育才迈入新纪元。华社领袖在中国维新和革命势力的影响下纷纷倡办新式学堂，当中思想较先进者更响应兴女学的号召，创立女校让女子有机会受教育。

私塾

19世纪末，新加坡华文教育以私塾和书院所提供的旧式教育为主，教师多来自中国，并借用会馆、宗祠、庙宇为教室，学习《三字经》、《千字文》、记账等内容。

新式学堂

自19世纪末，清政府便通过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官员南来巡视，协助发展南洋华文教育事业。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也开始参与兴学活动。1900年代初，新加坡和马来亚出现课程有别于私塾的新式学堂。它们采用中国教育部所发布的政策、学制等，以及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

双语教育

除了华社出资创办的学校，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些本地华族孩童也进入英殖民政府或教会所创办的英校就读，部分学校也开办华文课程，提倡双语教学。

女子教育

妇女在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社会地位卑微，而当时华校的学生清一色是男性。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和中国维新及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本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并着手在本地创设数所女校。

南洋大学：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

1950年代初，由于政治环境改变，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华文中学毕业生，已难以赴中国继续深造。本地华社意识到急需设立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应运而生。这所中国以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除了为来自东南亚的华校生提供升学机会，更让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拥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在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前，南大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培育了近二万名大学毕业生，为各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光阴的故事： 20世纪的校园生活

昔日的校园生活和如今的有什么不同？学生的书包里，都有哪些物品？此陈列以时间囊为设计灵感，展示了一些和20世纪校园生活相关的物品，让观众思考会以什么物品代表自己最珍贵的求学回忆。

褐色旧式皮箱书包（20世纪中）

1950年代的学生上学时不用背包，而是采用这款类似小行李箱的书包。

新加坡博物馆馆藏



从文言文 到白话文

20世纪初期在中国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本地华文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由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和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改革和文学革命，进一步促成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而北京政府更于1920年令全中国的学校和报刊采用白话文。当时，新加坡的许多学校亦改而以白话文教学，报章社论和评论更积极倡导白话文的学习和使用。

白话文的兴起

在白话文未兴起之前，一个中国人识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少数精英阶层能掌握作为正式书面语的古文，而这阻碍了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1917年，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让普通人也能识字。在1930至1960年代期间，文言文已几乎被白话文取代，而白话文教育大大提高了百姓的识字率

华文出版

在英殖民时期，新加坡曾是东南亚出版业的重镇。19世纪，鉴于中国禁止西方人在境内传教，西方传教士曾以新加坡为出版基地，大量印制华文宣教材料运往中国各地分发。到了20世纪，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章和教科书，亦曾在东南亚各地广泛流通。

早期 华文报刊

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是于1881年创办的《叻报》，其后直至1942年二战爆发前，本地前后约有20家华文报问世，其中包括《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国民日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这些报章的发起人大多是为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或商业目的而出资办报的商人。

商业报章 的崛起

20世纪初的华文报创办人，主要是财力有限的中产阶层商人，加上当时的读者不多，以致许多报纸收支不能平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1920年代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局面。直到1960年代，这两份商业报章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报界的佼佼者，并胜在资金雄厚，能够积极招揽报业人才和尝试创新的办报模式，而它们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亦有助于提高本地华文报章的素质。

排字印刷 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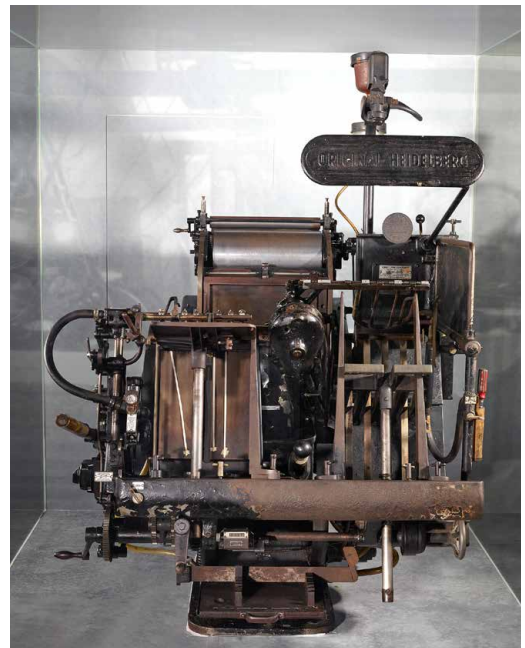
在1991年全面实行电脑化之前，本地华文报章是以手写稿和活字排版的印刷方式出版的。编辑部首先将手稿交给排字员，再由后者亲手将一个个字块挑出排成文章，排完版后抹上油墨并把一张纸覆盖在上面，将文章印在纸上进行校对。

海德堡“风车”印刷机（1950年代）

这台海德堡“风车”印刷机原为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县的冠英印务局所拥有。冠英印务局于1920年代成立，2016年结束营业，承印电影海报、结婚喜帖、公司名片等各种印刷品。

这台在德国制造的印刷机，送纸和收纸的动作如同转动的风车，因此俗称“风车”。这样的设计让它的印刷速度比其他的印刷机快一倍。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藏



报章文艺副刊 与马华新文学的滥觞

1919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标志了新马地区（包括婆罗洲）一种新式本土文学的出现。这类马华新文学，以本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它的产生既为满足当地华人的迫切要求，也受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

马华新文学以一般大众为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华文白话文学。为了让一般人阅读和欣赏，而采用白话写作并运用新式标点、章法等。作者尽量让作品简明易懂，以扩大读者范围发挥最大的教育作用。

拓展期

1925年过后，新马地区才兴起有组织、有意识的华文文学运动。此时的本地文学界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发表在《叻报》的《椰林》和《星光》，以及《新国民日报》的《南风》等副刊。1927年起，新马文坛更兴起提倡新兴意识和南洋色彩的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将焦点放在低下阶层的生活现实，题材方面更趋向本土化。

华文 教科书

在新式学堂于20世纪初出现后的数十年里，东南亚各地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由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出版。直到1930年代，本地华裔创办的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才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突破了中国出版社垄断东南亚华文教科书市场的局面。

华文教科书 出版社

新加坡战前颇具规模的华文书局有20多家，但有大量出版书籍的只有被誉为“新加坡五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与南洋书局。它们也是主导本地华文教科书出版的出版社。许多这类早期的书店，除了卖书和自行出版书籍，也兼卖文具。一些书局还具有其他功能，比如成为提供新、马、印三地华校教师的中介。

华人社团

19世纪的中国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谋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栖身和就业的问题。为了能够在陌生的环境生存和发展，讲共同方言或从事同一行业的同乡移民自然而然地凝聚在一起，相互帮忙。地缘性（祖籍地）、血缘性（姓氏）和业缘性（职业）组织应运而生。除了帮助会员解决住宿和就业问题，这些组织也举办祭祀和节庆活动，并照顾会员的身后事。它们在发展壮大后，亦出资创办学校和医院，并积极推动慈善事业。

地缘性组织

许多地缘性组织是从建立和管理坟山和庙宇开始，之后才成立会馆和互助会等团体。例如，本地福建领袖分别于1828年和1840年兴建漳泉人公冢恒山亭和天福宫为福建社群服务，1860年才在天福宫内附设福建会馆。

中山会馆

1821年成立的中山会馆（前身为香山公司、香邑馆、香山会馆）是本地最早成立的会馆之一，由早期移居到新马的香山（后改名为中山）华人成立。香山也是孙中山的家乡。该会馆为了彰显孙中山创建民国的历史意义，于1937年改名为中山会馆。



“香邑馆”（中山会馆前身）的牌匾（1845年）

新加坡中山会馆馆藏

血缘性组织

19世纪的血缘性组织，由来自同姓、讲同样方言的移民组成，以“社”、“宗祠”、“堂”、“馆”、“会馆”及“公会”等形式出现。本地最早的血缘性组织有曹家馆（约成立于1819年）、四邑陈氏会馆（成立于1848年）和台山黄家馆（成立于1854年）等。和地缘性组织相比，血缘性组织的会员人数较少，财力也较单薄。

业缘性组织

19世纪，从事同行同业的本地华人为了相互帮助及维护共同利益而发起行业公会，如戏班行会组织梨园堂（创立于1857年，八和会馆前身）、粤帮木匠组织北城行（创立于1868年），以及建筑业的鲁北行（1890年）。行业公会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据估计，这类组织在二战前的数量已达近100个，反映了当时华人行业的多样化。

华人 俱乐部

俱乐部原是商人经商之余的消闲场所。本地早期华人俱乐部的会员多半是社会地位崇高的殷商。然而，这些俱乐部除了是会员联络感情、建立人脉的地方，亦是华社领袖讨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课题，并推动华社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平台。

怡和轩俱乐部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是华社富商消闲的场所，会员无籍贯之限，但以闽籍居多。该俱乐部在新加坡华社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领导东南亚华人社会支持辛亥革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总部。二战结束后，南侨总会仍旧以怡和轩为会址，支持亚非国家反殖民运动。1950年代，它有份推动华社争取公民权及创办南洋大学。

吾庐俱乐部

吾庐俱乐部于1905年由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陈卓然等创立，初名“古寄乐”，1908年易名“吾庐俱乐部”，寓意“吾爱吾庐”，是一个闽籍富商的俱乐部。它位于客纳街，与维基利俱乐部毗邻。吾庐在二战前曾是新加坡华社最有势力的俱乐部之一，会员包括林文庆、陈延谦、郑古悦、薛中华、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等对新加坡有重要贡献的先贤人物。此外，由于当时几乎所有本地华资银行（如和丰、华侨和华商银行）的董事都是会员，因此它也有“银行家俱乐部”之称。

维基利俱乐部

位于客纳街的维基利俱乐部成立于1889年，发起人为李俊源、陈秋金等土生华人资本家，是当年唯一的侨生资本家俱乐部，领导层及会员能讲流利的英语，受殖民地官员器重。后来，并非土生华人的胡文虎也加入了维基利，并曾任其会长。

海天游艺会

海天游艺会成立于1913年，由粤籍闻人黄亚福、邱雁宾、吴胜鹏、卢文锡、方诵清等发起成立，原称耆英善社，创立初期是一个粤籍人士的俱乐部。会所设在广合源街（宝塔街）同福社内，后易名为海天俱乐部，1918年改名为海天游艺会。二战后，该会购置尼路的楼宇作为会所，后来又受市区重建计划影响再度搬迁，上世纪60年代迁至林德金路2号。

醉花林俱乐部

醉花林俱乐部于1845年由潮籍商人陈成宝创立，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陈成宝当时腾出位于庆利路的家族产业作为会所，会员在他逝世后捐资向陈氏家族购得该地，作为永久会址。它是潮籍商人休憩、联络乡谊、交换商情和展开娱乐活动的场所，在英殖民时期是本地潮帮的权力核心之一。醉花林的董事及会员曾积极捐助福利及教育事业、亦曾加入中国抗战筹赈的行列。

战后的 华社团体

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华社注册团体不断增加。当时新加坡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赋予华人社团新的使命。它们大多已完成了安顿与协助新移民的历史任务，而保留祭祖拜神、婚丧互助等功能。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华人社团逐渐式微。1984年12月2日，一个由九大会馆主办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的诞生定下基础。宗乡总会于1986年1月27日正式成立，由本地七家主要会馆为基干。

宗乡总会的宗旨包括培养、促进及加强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间的互相谅解、密切合作与联系，推动及赞助各种文教及社交活动，以促进华人对华文及华人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社团徽章

二战前及战后初期，本地华人仍心系家乡，并在政治认同上偏向中国。这样的思想也体现在当时华人社团的徽章上，而它们当中有许多在设计上都融入“青天白日”或梅花等民国国家象征的元素。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早期历史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立时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于1906年成立，是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华人商会之一。它是一个跨方言群、跨业缘的团体，而它的创立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1914年，它与南洋华侨总商会合并，最终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 **禧街47号**

总商会创立初期以同济医院为会所，不久后便租下禧街49号（现为47号）的大夫第（当时为潮州富商黄亚佛的宅邸），并于1911年以5万5000元将其买下，沿用迄今。

领导华社

在英殖民时期，总商会被中、英政府视为新加坡华人最高机构，并以其领导地位为华社谋福利、调解华社纠纷，并推动本地华人支持中国赈灾、革命和对抗日本侵略。在新加坡迈向自治和独立时期，总商会为华人居民争取政治权利，并鼓励他们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 **在关键时刻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后，新加坡成为了东南亚华社抗日救亡筹赈运动的中心。本地著名华社领袖陈嘉庚于同年8月15日召集来自118个华人社团的约700名代表，在总商会举行侨民大会，即席成立星华筹赈会，后又于1938年10月10日组织了统筹东南亚筹赈活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这两个筹赈会皆获得总商会及其领导人的踊跃支持。

- **南侨机工**

随着中国主要沿海城市被日军占领，其海上运输通道几乎全被切断。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但它缺乏熟练的货车维修人员及驾驶员。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近3200名南洋青年分批到中国担任义务修车员和驾驶员。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和巴株峇辖的80人“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队”于1939年2月18日从新加坡出发。这些南侨机工肩负运送物资和10万军人入缅作战的重要任务。据统计，滇缅公路上的运输车辆超过3000辆，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便是由南侨机工驾驶的。机工在前线的生活艰险，更有三分之一的人数殉职。

- **黑暗之年**

1942年2月15日，英军无条件投降。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将其改名为昭南岛，并启动“大检证”（又称“肃清”）行动捕杀抗日分子，而他们的目标包括积极支持抗日的华社领袖。当中如陈嘉庚、时任总商会会长连赢洲、陈六使和李光前等人及时逃出生天，但未能逃离的其他华商领袖被日军胁迫组织华侨协会以及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保全本地华人生命和财产的条件。

- **“大检证”行动遇难者**

“大检证”在英军投降后不久立即展开，为期一个月左右。凡年龄介于18至50岁的男子必须到遍布全岛各地的登记所接受审问，没有通过检证的人被送至郊区杀害。被捕杀的不仅有抗日游击队、持武华人、义勇军以及支持抗日的华社领袖，还包括不少老师、律师和学生等平民。

- **为日据时期死难人民讨回公道**

1962年初，新加坡的实乞纳、樟宜和武吉知马等地区相继发现日据时期死难者的遗骸。总商会当时肩负安置这些遗骸的严峻任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美芝路划出一块4.5英亩的土地建设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和公园。

总商会为此成立募捐委员会，并于1963年8月在政府大厦召开群众大会，为沦陷时期死难人民向日本政府索偿。来自各族群的逾十万人出席了该次大会。日本政府最终在1966年答应赔偿，部分款项用于建造纪念碑。

耗资30万元的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即新加坡沦陷25周年纪念日由建国总理李光耀揭幕。此后，总商会每年2月15日都会到纪念碑现场举行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祭礼，而这一天也是新加坡的全民防卫日。

支持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经历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治、并入马来西亚，以及最终成为独立国家的过程。总商会积极参与新加坡建国历程，借本地商界之力量促进贸易，并鼓励华人登记成为新加坡公民，履行保家卫国的责任。

- **庆祝自治**

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为了纪念此事，总商会主办“庆祝新加坡自治博览会”，举办地点为旧加冷机场。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的约3000人和450个参展商参与了这个为期两个月的博览会。

宗风远鬯

这幅由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赠送给总商会的“宗风远鬯”匾额，曾高挂在其原大楼里，醒目的四个字提醒着后世，他们肩负将先贤遗风发扬光大的使命。此后，总商会历届领导人不负重任，并通过回馈社会、保存历史和传承文化等方式延续华社先贤伟大的精神。



徐世昌大总统颁赠总商会之“宗风远鬯”匾额（1920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珍藏

- **保存晚晴园**

晚晴园以孙中山故居（今日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形式保存下来，是总商会对保留新加坡华社历史遗产的贡献之一。晚晴园于1994年被列为国家古迹并屹立至今，有赖于六位华商先贤当初的古道热肠，于1937年及时购回这栋别墅，避免它被拆除。总商会过后更在1951年接手晚晴园，并在1966年孙中山100周年诞辰时将其修葺并开放。

2009年，总商会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将晚晴园交由文物局定位为文物机构管理。此举为晚晴园的发展掀开新篇章。并巩固了它作为华社共同记忆与珍贵历史遗产的地位。

- **六君子购回晚晴园始末**

根据周献瑞于1947年11月12日接受本地报章采访时所述，当年六名华社领袖购回晚晴园的始末如下：

抗战前有一天，杨吉兆设宴款待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周献瑞也应邀出席。众人在席间商讨要购回晚晴园。周献瑞一听，立刻响应后离开宴席，分别找了李俊承、李光前和陈延谦，获得三人答应各认捐千元。加上周献瑞本人已认捐千元，以及杨吉兆与李振殿各捐款500元，六人的捐款足以收购晚晴园。在凑足金额后，大家辗转找到业主，但业主说已有人与他商议要拆购晚晴园的砖木。经多次磋商，双方最终以5200元成交。

继往开来

1961年，总商会拆除禧街旧会所，在原址建起新的大楼。总商会新厦于1964年落成并开幕，是一座楼高九层、中西合璧的建筑物。2017年，总商会大楼再度进行翻修，并于2019年8月竣工开幕。